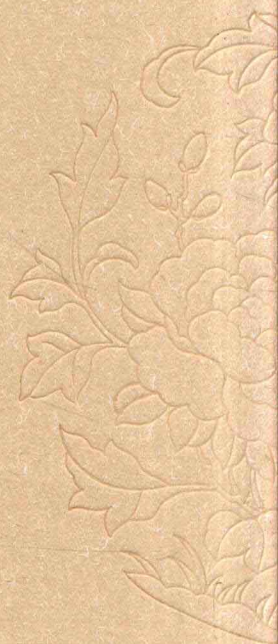


吳士余

自选集

● 吴士余 著



吴士余自选集 | 吴士余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士余自选集/吴士余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309-08992-9

I. 吴… II. 吴…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8180 号

吴士余自选集

吴士余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 字数 276 千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992-9/C·238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百家讲坛”现象的思考 /1

学术出版的可持续性 /4

直说专业化出版 /7

重树新时期文学精神 /10

文化传承与人生求索 /13

学术的打假与创新 /17

倾听后的切问：我是谁 /23

守望理性 /26

超越恐惧 /32

回到马克思 /37

科学是什么 /43

挑战史学传统 /48

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 /54

跨语际的实践 /60

寻找文化对接 /65

文化西渐与融合 /71

江湖的文化解构 /78

行走的殷学 /87

阅读经典 /92

文学史的现代性考察 /96

金庸小说与公众阅读 /101

欲望书写与文学精神 /107

鲍曼的演绎 /112

直面个体 /117

理论的谋略与尴尬 /124

非典与社会资本 /131

走出性私域 /137

数字化趋同与鸿沟 /143

言说知识分子 /148

诠释人生悖论 /154

心灵约会 /158

经济人的伦理 /162

个人化的权力陷阱 /168

顿悟思辨的散文书写 /174

演绎红色经典 /180

苦难中拥抱阳光 /186

消费时代的文学叙事 /192

现代文坛的“鬼才”作家 /197

电子人的乌托邦幻想 /202

传统范式的现代重构 /208

解读美国精神 /215

宣传：制造社会共识 /221

人生体察与文化自觉 /226

出版泡沫与政府规制 /233

历史的评说 /237

历史模型的人文考量 /245

表象的历史陈述 /252

城市言说与记忆 /258

康熙诚和善治 /262

靳辅治河八疏 /265

经筵日讲 /268

除弊才能立政 /270

雍正的文字狱 /273

乾隆宽严相济 /278

乾隆二说 /281

嘉庆整饬吏治 /287

嘉庆禁鸦片 /289

道光治司法乱象 /291

后记 /295

“百家讲坛”现象的思考

“百家讲坛”制造了一批大众学术明星，也制造了新媒体时代的出版。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走红了图书市场，也诱发了出版人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热情和想象空间。以“国学”为品牌的大众学术著述不再是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的专利，已成为专营人文、童书乃至科普出版人追逐的“猎物”。从表象看，国学热、“百家讲坛”热，是学术出版顺应市场的一种转型，然而，这一出版文化现象的辐射面之广，社会影响之大，以及文化内涵与传递的持久性，则远远超过“80后”的青春文学和时尚文化，其文化影响力丝毫不逊于“文革”后书荒的阅读复苏。

解读“百家讲坛”现象，对出版人有值得思考之处。

国学热、“百家讲坛”热成为新媒体时代的阅读聚焦，意味着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这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西方文化思想为人们精神支撑的一个反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百余位作家、艺术家签名、联合倡议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却未能引起出版界的关注，后又遭到崇尚西方思想文化的学者质疑和抨击而偃旗息鼓。时下，由“百家讲坛”引发的国学热，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在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化经典，同样是人们迫切需要的思想资源。当今社会改革因利益调整而矛盾起伏，社会需要和谐，“和合”的伦理哲学，“中和”的文化思维仍可成为人们构造和谐社会与文明，重塑信念、规范行为的精神基础。发人深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阅读普及，几乎中断了20年（对时下青年大众，几乎需要扫传统文化之盲）。就这点而言，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学术的大众化出版有很大的空间。“百家讲坛”普及国学还属刚起步。

“百家讲坛”普及中华文化经典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国学的大众化可以一窝

蜂或无序竞争。出版需要规划、梳理,更需要创新,否则,低水平的重复,做浅、做俗、做滥将是不可避免。“文革”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以高质量、高品位的经典文学名著引领市场,经典名著便成了奶酪,谁都要动一下,咬一口,不论有否翻译资质、版权资源,出版界赶集似的蜂拥而上。冷饭炒热、炒焦,在所不惜。市场最终不堪重负,以至无人问津,沦落到称斤卖。这个教训不谓不沉痛。

说规划。就是要把国学的范围搞明晰,不能仅仅几本《论语》、《庄子》,几部古典小说《三国》、《红楼梦》。我赞同朱维铮先生的意见,国学应涵盖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文学、宗教等各个学科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涵厚重,涵盖面广,需要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递次渐进地组织不同层次的选题对大众读者进行普及。

要梳理。中国文化经典经过历史的积淀,精华糟粕共存。尤其是在当下的大众读者,对典籍的阅读还缺一种判断的能力和自觉。写作者、出版者对学术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化究竟要给读者什么?这便有一个文化取向和价值取向的问题。是疑古复古,还是古为今用,是其一;注疏典籍,历来是百家百言,何况是解读,是其二。纯学术出版可以百家争鸣,但学术的大众化就需要有所引导和选择。我很赞同一种批评:于丹的《论语》心得,只讲了孔子的积极一面,没有批评其消极的一面。如果大众学术文化照抄这一路径,并形成一种出版定势,这便会误导读者。

说创新。学术经典的普及应该有多种形式。“百家讲坛”采用的是演义讲史的路径,加上电视传媒的形象显示,正史、野史的糅合,让大众读者在听故事的感受中学历史,评介人物,这是一种。读者虽易听、易懂,但毕竟正史、野史难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悦读经典》一百句,是采用学者解读评析的方式,有引导、有分析,也是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古典文学的评析读本加入彩图元素,适应后读图时代的大众阅读兴趣,又是一种。不管如何,新媒体时代学术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化是要走一条让读者喜闻乐见的道路。教科书式、百科知识汇编式的通俗著作似乎已引不起当下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

“百家讲坛”的出版文化现象,凸显了出版传导模式的转型。具体地说,是媒体宣传、作者的名人效应已成为出版市场传导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这些动力元素的加入,国学、文化典籍的出版只能成为图书馆的收藏,小众学者的交

流,而不能演绎成大众的阅读潮。

但严峻的是,出版业不可能依赖大投入来解决文化典籍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运作。现在,出版界将“百家讲坛”出版模式视作一种路径依赖,这就有了危险性。将出版模式的转型简单地理解为媒体宣传造势,结果,学术的大众化成为“血拼”的恶性竞争。因此,当务之急,出版人要思考的是:新媒体时代学术大众化的市场运作的课题。

2008年1月

学术出版的可持续性

数年前,笔者曾在文汇新闻时评专栏发表短文《构建学术文化的出版高地》(《文汇报》2004年4月4日),引起出版业界及媒体的关注。拙文言说的是,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出版业界曾以海纳百川、开明睿智的文化精神,“商务”、“中华”的学术文化的出版旗帜,为中华文明和文化思想库建设写下现代出版史的浓重一页,新时期的上海出版业应坚守学术文化理念,继承、发扬学术出版精神,构建新时期的出版文化高地。当然,拙文的言说只拘于历史的比较。

当下,上海出版业处在文化大都市建设新的文化环境中,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上海意识已成为考量学术出版可否持续和创新的标杆,其基本特征是现代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而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则构成了它的重要内涵。因此,学术文化的高地建设,不只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体的新文化建设,也体现在上海文化精神的张扬,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融汇成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承。由此,上海学术文化出版需要补充一个新的视角:面向当代与可持续发展。

上海学术出版的优势与专业强势是不容置疑的,它已成为支撑上海出版业,凸显其文化影响力的关键所在。若作些概述,以下几点是为业界所公认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整理与研究成果的出版,尤其是古籍整理(如《续修四库全书》、《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华本草》等)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集成式重大项目,如大型文库、工具书、通史、图志、文集具有较强的策划能力,二度创造能力和较高水平的实施能力;上海本土文化资源的集成与研究,具有文化资源的垄断性,上海出版界显示超强的优势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人文学科的某些专业学科理论建设(如文学、历史、经济),在专业的学术研究中均有突破性成果,如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编》、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等,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被广泛应用,为专业学科理论建设起到核心的集聚效应。

但笔者认为,上海学术出版的专业优势不应限于历史文化的积累,它的可持续发展还应体现在对人类精神文明及学术文化的前瞻性生发和创新上。这需要出版人对社会转变与发展过程有一个主体性认知,建构一个有影响力和文化张力的学术出版路径,这才能持久地将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资源融合成经典图书产品。时下学术出版的前瞻性就需要投注于贴近中国当代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发展的实践,解惑、研究当代的理论问题,综合现代思想文化资源,包括海外的学术实践与研究,充分展示学术出版的思想力,此其一。其二,通过学术出版的平台,能造就和扶植一批中青年学术领军人才和海归学者。这是学术文化出版高地建设应承担的双重任务。这一点显然是上海学术出版的软肋,或说是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上海的学术出版资源至为丰富,实现高地建设的新目标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近期,笔者有幸参与一项重大出版工程的策划,其间,复旦、同济、上海财经、上海师大等高校近百位教授提供的选题均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前沿学术研究,如变革时代的中国政治挑战与回应、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家治理、中国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等,课题纳入全球化的视野,融汇海外学术思维 and 实践经验,学术成果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前瞻性,其学术水准处于全国专业理论的前沿,其中不少已列入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这些成果的出版无疑可突破上海学术出版的发展瓶颈,产生重大的文化影响力。然而,这些学术资源尚未进入上海出版人的视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由此,笔者感悟到:学术文化出版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提升出版业的“软实力”。当务之急是——

搭建出版业界与高校、科研界的学术信息沟通平台。高校、科研界是学术资源的聚集地,也是学术出版规模化、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缺乏信息的沟通,出版业界难以将学术成果迅速转化为出版物,使学术出版与学术研究保持同步,自然也难以充分发掘学术出版可持续的潜能,也谈不上持续培育新的强势学术专业,强化新的出版路径。

培育出版业界的学术策划团队。这既是培养高端出版人才的需要,也是确保持续发展学术文化出版的基本条件。出版业界的现状是,学术出版策划尚处

在一种个体化的松散局面,策划者依赖个人狭隘的人脉关系,缺乏对学术动态、趋势的了解和专业评估,尤其是多学科、跨学科专业知识的缺失,将会导致编辑出版的某些极致倾向:一是失去与学者对话的话语权,难以通过编辑的创意提升学术成果的质量;二是缺乏选题的专业判断,或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或是重名轻学,唯名人舍取选题,使学术出版异化为简单化的加工制作,不利于中青年学人的脱颖而出,弱化了学术文化的出版生产力;或是因学术敏感力不强,导致上海学术出版资源的外流。

建立有效的学术出版协调机制。学术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应该是一种集多种出版要素于一体的综合行为,这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予以保障,其中包括政府的窗口指导,出版机构的行业协调,这有利于整合优质的学术资源,重点投放资金,实现资源与效益的最大化,有效避免学术文化资源的泛用、非专业化、低水平重复出版的弊病。

建构学术文化的出版高地,不仅要培育具有相当文化影响力的传统优势专业,以及能产生当代学术文化聚集效应的新的强势专业,也需要培育出版业界自身可持续的综合竞争力。出版业的学术“软实力”建设应是题中之意。

2008年1月

在文化知识读物中,阅读印象甚深的是两套书。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生活译丛”,一是新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悦读经典丛书”。“文化生活译丛”不乏经典之作:瓦西列夫的《情爱论》、科恩的《自我论》、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房龙的《宽容》等。书著面市,广受关注,屡屡重版,畅销不已,尤其是青年读者至今还视作生活的指南。“悦读经典丛书”亦然。若将丛书归类,基本上可分为文化典籍的解读(如《论语一百句》、《荀子一百句》、《朱子一百句》),流行通俗文学的品赏(如《古龙一百句》)。文化典籍的注释与通俗解读早已被做熟做泛,“百家讲坛热”之后的跟风,书市已现泛滥之忧。而“悦读经典丛书”精选典籍一百句,由专家学者重点解读。解典释义,文本通俗,去芜存菁,明晰哲理,触类旁通,洞鉴传统之文化精神。丛书通俗显新,读之回味无穷。如《古龙一百句》选取古龙小说中一百余句经典文句,演绎古龙塑造的浪子形象,文化解读侧重于人生的思想启示,小说品读也由审美转为审世俗、审人性,阐释小说形象折射社会的文学底蕴也更具普适性。专业的出版意识和选题立意将通俗文学的文化解读经典化了。

文化典籍的解读旨在通俗化的前提下,揭示传统文化精神的要义;通俗文学的品读则是超越阅读记忆提升文化精神的理性领悟。这些都是对出版人专业化意识的一种考量。“文化生活译丛”、“悦读经典丛书”的成功,得益于出版人注重专业化的出版意识,无论是原创,还是文化引进,图书生产应着重于人文的专业定位,知识内涵的主题性选择与提升,文化价值的预设才能通过阅读鉴赏得以实现。

专业化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出版路径。作为内容产业,文化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思想资源的开发、使用和产品转化中。而出版资源是一种动态

的、可再生性的资源,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其资源是公共性的,难以独占和垄断。图书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就在于通过专业化的出版路径对出版资源作积极、有效的开发和整合。凡在人们阅读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品牌书,无不是以出版人的专业化为要义的。“商务”的品牌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引进西方古典、现代的经典,特邀专业学科造诣颇深的学者精译。该丛书被学界、出版界公认为学术译著的经典,至今还成为学界研究西方人文思想和智慧的理论资源。最近获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知识界极力推崇的“走向世界丛书”再次重版,也正因为出版者为人们打开了西方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之窗,为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知识基础。可见,出版的专业化路径正是出版创新的前提,一旦成为出版社的传统,其图书的品牌效应便具有长效性。

但问题是,当下的出版界少有人强调专业化的出版理念。泛专业、非专业的出版倾向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学中文的编理财读物,学哲学的编讲史演义,编书只管文字,不管专业,专业术语、史料典故、知识错误屡见不鲜。专业性出版社改向综合性已被当作一种时尚,其目的无非是扩大出版范围,增强市场的竞争力。但事与愿违,搞人文科学的出版社未必能产出有震撼力的长篇小说;搞古籍整理、文学诗歌的出版社编炒股秘诀也常常是隔靴搔痒,至今还鲜知有成功的例子。相反,专业出版的弱化或边缘化而导致出版业绩滑坡者并不少见。市场逐利的羊群效应致使一些出版社丢弃曾是立命之本的专业意识,如此作坊式生产,岂有精品、经典可言?

何谓专业化出版?传统的说法是按文、史、哲、经归类,划定出版的专业范围。新中国出版业恪守这一传统理念已近半个世纪。随着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跨学科的交叉与融汇已形成新的态势,若机械地恪守传统专业分工的出版路径便显得过于狭隘了。专业化出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宜以基本学科为基础或核心,从两个层面辐射、拓展出版空间,一是专业学科的细分化,二是专业学科的跨学科化,可按同心圆的原理,有层次地广延。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融科学、哲学、逻辑学、社会学诸学科知识为一体的经典名著,其理论核心则是动态的科学哲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也不是单一的传统美学著作,已是将现代心理学融入审美心理功能的个体差异、审美满足、创造性的灵感的新美学研究领域。开放性的专业

化出版可以拓展更为宽广的出版空间,而这些也符合当代人文学科发展的趋势。

若从出版路径层面作深一步思考,专业化出版还应有另一层含义。我的理解是,出版社应根据所拥有的内容资源、专业编辑人才,针对市场供需进行专业化图书生产和服务。具体地说,则是:一、确立明晰的专业框架,注重专业出版的主体性选择;二、积累、整合出版资源,培育强势专业出版,形成出版社的个性与品牌;三、应对市场变局,不断创新出版思维,谋划专业出版的战略高地;四、根据新兴学科的形成、成熟期逐步推出相应产品,在动态跟踪中逐步完善、定型和体系化;五、不为市场短期利诱所惑,创新专业出版的营运模式,等等。专业化出版路径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出版专业化的过程,也是出版优势积累与凸显的过程。一个出版社不可能对人文社会学科作全覆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为者,则是将优质内容资源转化为强势出版。这种转化一是能保持原有的优势品牌,二是能顺应人文学科的专业发展态势,作目标预期的投入和开拓。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方面可谓佼佼者。该社在倾力完成《续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后,又致力于《清代诗文集丛刊》、《盛宣怀档案》整理,这些大型文献的整理正是该社品牌优势的延续,在海内外产生令人瞩目的影响。专业化的出版优势一旦形成定势,便能营造一种自觉的文化氛围,有效抵御市场短期功利主义的诱惑,使编辑群体自觉地潜心专业出版的创新。薪火相传,不仅精品迭出,且人才辈出,打造真正的出版高地,引领大都市文化,也就不是一句空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具有较大文化影响力的出版社,往往体现在该社长期积淀的专业优势之中。为此,将专业化列为考核出版社的刚性指标,乃是必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已进入读者细分化时代,主题性阅读、个性化阅读业已成为一种新态势,出版业要适应这一趋势,更需要维护、夯实专业化的出版路径。

2008年7月

重树新时期文学精神

由著名作家王安忆、资深出版人孙颀策划、主编的白玉兰文学丛书业已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2008 年出版)。丛书重现了上海实力派作家的风采,所选作品颇能代表上海作家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水准。如王安忆《长恨歌》、王小鹰《丹青引》、叶辛《蹉跎岁月》、竹林《女巫》、赵长天《不是忏悔》、陆星儿《痛》、沈善增《正常人》、程乃珊《金融家》、陈村《从前》等。王安忆、孙颀在序文中有这样的言说:80 年代是一个文学的繁荣时期,上海作家被新时期文学的浪涛推波助澜,登上舞台,同时又承当起新时期文学的主力(王安忆);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小说家们的记录,各有侧重不同,而作家的观察与书写把城市的画像丰富起来(孙颀)。确实如此,丛书再读,除油然而生的亲切感,更有一重体验出版的回味。

上世纪 80 年代,“文革”后的出版复苏呈现两大热点,一是世界文学名著的普及,二是知青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繁荣,由此推动全民的文学阅读。上海的文学创作和出版适时涌现一批为全国文坛瞩目的作家群和文学编辑,有的成为文学界、出版界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上海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力,一度成为全国的一个风向标。究其原因是,上海的文学创作和出版鲜明地聚焦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张扬。具体地说,呈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直面人生,介入生活,真实记录社会激荡中上海人的生活史、心灵史,文学作品与广大读者的零距离接触,有着共同的人性诉求;二是充满激情而坚守理性的现实批判精神,文学叙事与思想言说的和谐与共振产生强烈的感染力。白玉兰丛书选编的长篇小说,不少是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叙事,这是新时期上海作家倾心而执着的话题。《蹉跎岁月》、《从前》、《痛》、《正常人》都留下了这段催熟成长的历史记忆。这些作品拒绝文学教条,将社会、时代、人的本义存在记录于个人

体验和文学理想的文学叙事中。当然,收入丛书的小说远不限于知青文学。上海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还广及众多层面,如竹林《女巫》对文化寻根的探索,孙甘露《呼吸》对新时期文学的文本书写实验,赵长天《不是忏悔》、王小鹰《丹青引》对城市人生的冷峻批判,都引起文坛与读者的关注。然而,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都表示出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一种自觉。正如王安忆所总结的那样,“我们这些写作者,主要的特征是现实主义”,“我们前后大约跨越两代,远至‘五四’新文学,近到新时期文学,可说是我们共同的养料,我们都怀有对生活 and 人的关怀。”白玉兰文学丛书收入上海实力派作家的精品力作,集中反映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这些文学精品的审美价值不局限于生动的文学叙事和个性化的文本书写,更多是对时代、社会、人生作冷峻的反省。白玉兰文学丛书的出版,也不单单是对上海作家文学创作作一次历史总结和回顾,更可以看作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出版界的一种价值回归,其意义应超过作品重版的自身。

二十多年过去了,新时期文学已成为历史的话题。处在经济社会中的上海文学界、出版界受到文化消费主义滥觞的冲击和消蚀,尤其是作家、出版人,读者常常被内容苍白、思想平庸、包装五光十色的文学碎片所惑,市场炒作的热衷替代了文学精品的创作与出版的文化责任,新时期文学曾一度高扬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被弱化或被边缘化,新时期文学的精品逐渐淡出读者的文学阅读,甚至已被新一代青年、作家们遗忘。这一现象若不及时纠偏,且毫无节制地蔓延,难免会出现文化的倒退。这显然与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导向相悖的。

为此,我建议,上海的文学界、出版界重树新时期文学精神,作家、出版人、媒体人应该联手,构造一个高扬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新的文化效应,就像“百家讲坛”普及传统文化经典那样,营造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回归的创作自觉和出版自觉的文化氛围,推进上海的文学创作,提升上海出版界的文化影响力。

白玉兰文学丛书记录的是上海的历史,出版界更需要作家对上海的今天作出回应和新的思考。尤其是,上海处在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大社会变革中,需要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通过文学作品传递上海的文化影响力。